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家族文化与20世纪 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杨经建 著



岳麓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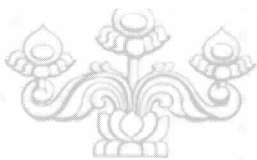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家族文化与20世纪 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 杨经建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族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杨经建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5

ISBN 7—80665—655—3

I. 家... II. 杨...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036 号

家族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

作 者:杨经建

责任编辑:马美著

封面设计:周 畅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02 千字

印数:1—3,000

ISBN7—80665—655—3/G·474

定价:18.00 元

承印:长沙天彩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410200 电话:0731—806221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总 序

凌 宇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间,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

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

人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订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覡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 with 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

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李运抟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阐释人文精神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变,成为其题中之义,且多新见;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于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序

於可训

大约五年前,我收到湖南一家出版社(或许是资助这本书的学校的基金会)寄来的一部书稿,是要求评审的。书稿的名称叫《世纪末的文学景观》,作者是杨经建。类似这种评审的事,因为近年来经历得多了,虽然不敢稍有马虎和懈怠,但终究很难激起个人的兴趣。但杨经建的这部书稿不同,一入眼我便读得津津有味。一个置身于世纪之交的文学研究者,面对刚刚成为过去的所谓“世纪末”文学,不为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流所裹挟,不为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所迷惑,也不为五花八门的广告、炒作和评论所左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从这种纷乱无序的状态中,清理出一些清晰可见的发展线索,从这种变动不居的进行时态中,把握住一种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脉搏,当时就觉得这位作者很有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功底。又想到这位作者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于是就搜索枯肠,在记忆中寻找这位作者的下落。突然记起某年我曾到湖南去过,结识过一批学界新进,其中似乎就有一个叫杨经建的,而且还记起是湖南师范大学(当时似乎还称为学院)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进而又联想到曾读

过杨经建的一些文章,印象也颇深刻。在追寻了与杨经建的这些联系之后,我对这部书稿的印象自然就更好了。于是欣然向送评部门郑重推荐。这件事之后,我是怎么与杨经建建立联系的,现在已记不起来了。这部书稿后来自然是如期出版了,好像是在杨经建给我寄来这本书之后,我才向他讲了这段“故事”,同时也问及他的教学和科研近况。我们在通讯中具体说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但似乎就是在这一轮通讯中,我提出他可以以同等学力的名义来武大申请博士学位。他后来果然走了这一条边工作边学习的艰难“攻博”之路,成了我门下的一名博士生,其时,在他供职的学校,他已经获得了教授的职称。

他后来的博士论文所选的题目,就是这本叫做《世纪末的文学景观》的专著中的一个问题。在这本书中,他针对世纪末文学中出现的众多家族小说,研究了在这些作品中隐含的一种他称之为“家族神话”的叙事母题,并对这种母题的成因及主要表现,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梳理和论述。从已开辟的一些论题看,基本上已经触及到了这一母题研究可能有的“意义关涉”的一些主要方面。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所以当他把博士论文的选题最终锁定为“家族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而且从当下视野进入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家族文学,在我看来,也不失为一个富有“当代性”的研究角度。后来,我还进一步得知,事实上,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研读作品和理论资料方面的准备。可见他是谨遵他的那位伟大的乡先贤的遗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

话虽这么说,把一个只是针对世纪末这一个具体的文学时段中的问题,扩展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而且

还要与家族文化这样的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从中找出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论述家族文学的一些基本母题，谈何容易。但杨经建的论文最终还是按照既定的计划和目标完成了，那结果，他本人自然是满意的，作为指导教师，我也表示满意，在送交校内外专家评审和最终提交答辩时，校内外专家和答辩委员们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评价，可见他的心血没有白费。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杨经建是有始有终地完成了从世纪末“回溯”整个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这一义宏旨远的文学研究课题。

如同多数湘中学人一样，杨经建也是一个极执拗极顶真的人。从这篇已经完成的论文可以看出，他几乎通读了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今中外可以称之为家族文学的经典名作，和与家族有关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的家族文学经典。虽然我也曾向他提出，他手中的掌握的这把“家族文学”的尺子，有时候也未免过于的有弹性，以至于难免给人造成“泛化”的印象。我甚至建议他去掉他的研究对象中的“家族”二字，把他的研究对象由“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扩大到“20 世纪中国文学母题”，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泛化”现象的发生，同时也给作者自己预留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论说空间。虽然由于一些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最终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但他的这种在语言学界较为通行而为文学界所不取的“穷尽”式的搜罗研读的方法和态度，我还是十分欣赏的。因为家族文学母题与家族文化直接相关，而所谓家族文化又与人类的自然史和文明史紧密相连，所以在系统研读作为研究对象的家族文学作品的同时，作者还得深入研习相关的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理论。这些方面的理论虽然都不是杨经建的专学，但在运用这些理论透视和分析他的

研究对象的过程中,都达到熟练自如的程度,可见非一日之功,亦非皮相之得。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学者,杨经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和品格、个性和气质。

现在,杨经建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面对他的这一份倾数年心血的结晶,除了表示祝贺之意外,我能说的,只是与这篇论文有关的一些缘起、“本事”和“掌故”,其他的,就只有交给读者去评论了。

是为序。

2005年6月25日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目 录

- 绪 论 /1
- 第一章 家园皈依意识与追寻母题 /26
- 乡关何处与家园永恒 /26
- 祈盼家园与漂泊还乡 /38
- 探求(艺术)救赎与追寻(文学)
 归宿 /48
- 第二章 男权制文明与审父母题 /74
- 人类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
 权文明的演化 /74
- 父性权威话语在中西文明形态
 中殊途同归的表意方式 /80
- 在文学叙事中重构与解构的
 “父亲”形象体系 /92
- 第三章 重返母体与失乐园母题 /134
- 人类的“乐园”情结:从伊甸园
 到桃花源 /134
- 人类文明的逻辑性复归:回归

- 母体与寻找乐园 138
- 走近弥尔顿命题：“失乐园”叙事与“复乐园”
诉求 /155
- 第四章 宗法血缘秩序与乱伦母题 /188**
- 乱伦现象：人类文明的一种非理性
“标记” /188
- 乱伦禁忌：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范 /194
- 乱伦：一种重要的文学母题话语与创作叙事
资源 /200
- 乱伦文学的母题样态：“天契型”，“性虐取
型”，“情欲型” /213
- 第五章 家族至上观念与复仇母题 /228**
- 血亲复仇叙事与家族伦理法则 /229
- 美迪亚式复仇与“痴心女子”的心灵
悲剧 /239
- 另类复仇母题的不同呈现形态 /244
- 复仇文学母题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中西对比中
阐释 /249
- 结 语 /268**
- 参考文献 /274**
- 后 记 /279**

绪 论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一方面是“人”(个体存在)与“家”(起码的群体生存)不断的融合(包括离析中的重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行走”(离家)和“栖息”(归家)的生命历程。当“家”成为人类一种基本的生命取向和必然的人生归宿时,便如美国当代作家阿历克斯·哈利在小说《根》中所说的“当你开始谈论家庭、世系和祖先时,你就是谈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家族”：人类最基本的文化心理情结和精神价值确认

人类首先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又只有通过与他人产生并发展关系，进而结成群体才能适应大自然，才能建立一定的生活秩序得以生存下来，这就有了家庭、家族乃至社会、国家。人诞生又死亡，家庭组成又分解，而家族却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维持着人类的生存与延展。简言之，人类社会的各种存在状态和各个发展阶段，不管其文明进步的程度如何，在社会内部人们只有年龄、性别、家族和亲属关系的划分是永存的，这三种天赋身份存在于所有社会中，因此，与生存、死亡、爱欲一样，“家族”作为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文化心理情结和精神价值确认也从来就存在于人类的观念形态中。

家族，又称宗族，它是以家庭为核心实体的以血缘与性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社会自我协调的结构产物和基本单位，是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双重互动的必然结果。在古代社会中，家族常表现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居在某一区域，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利益共同体。家庭是家族的基本构成单元，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正是借助于血缘关系扩展成家族。按照林耀华的说法，在一个家族中，“家庭是最小的单位，家有家长，积若干家而成户，户有户长，积若干户而成支，支有支长，积若干支而成房，房有房长，积若干房而成族，族有族长。下上而推，有条不紊”^①。同宗同族之人集为宗族。因而

^①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

宗族乃家族的扩大,人们也因此常常用宗族代称家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的历史文化内核的秩序化实体,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家族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的系统,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的各个方面。家族的发展演变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 and 演变趋势,探讨家族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也是历史学,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目前有关家族和家庭的文献著述来看,学界对家族的解释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家族看成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封闭性的、具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功能的体系;另一种是把家族看成是家庭之上的虚体或纯粹的意识形态和认同感。要言之,家族的含义既具有“实”的一面,即社会的外观形态;又具有“虚”的一面,即文化表征意义。

毋庸讳言,东方(尤指中国)与西方对家族的社会历史实践形式和家族文化的精神价值确认有其差异之处。在国内较为普泛的看法往往是: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一代伟人孙中山曾断言,中间组织的不发达是西方社会的特征,因为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与国家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而“中国个人之外注重家族”,“国民与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①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也指出,西方社会的基本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240页。

特征是“个人本位,阶级竞争”,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家族为社会组织细胞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① 与其相应,20世纪以来国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一般也倾向于把家族本位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以之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相比较。以研究中国著称的西方权威学者费正清在讨论中国社会的结构时也曾指出,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中国的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是一个微型的邦国。^② 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③。有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李大钊曾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一文中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区分为“以农业为本位”和“以工商为本位”的两类文明,而“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制度——个人主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则用体现出“差序格局”原则和“团体格局”原则,富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的“事业组织”和主要承担生育功能的“生活堡垒”分别来指称中国传统家族体制和西方传统家族体制。老一辈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明

① 转引自岳庆平:《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8页。

③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